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全”“深”:中国改革的新特点

常修泽

如何看待并把握中国改革的精髓与趋势?笔者在多年研究中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后,不由得想起毛泽东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今天我们看中国改革的大势,也必须突破狭隘眼界,“放眼量”世界,“放眼量”历史。

从世界来看,《决定》再次申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强调在抓住战略机遇的同时也要“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并“与世界人民一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的历史方位看,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心任务,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在改革进入“新阶段”、人民需求“新变化”、民族复兴“新目标”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把握中国改革的精髓和演进趋势呢?笔者认为,可简要归纳为三个字——“进”“全”“深”,笔者把它称为中国改革的“新三字经”。

“进”: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进”,是方向问题。改革大业恰如古人所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必须“进”,即《决定》总标题第一个关键词“进一步”。

不妨从中国改革46年来笔者亲历的“五个第一”,看改革的“进”:

开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战略决策。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吹响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号角。

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勇敢地改变了原来十二大提出、并在该《决定》原起草组一开始拿出的第一篇中沿用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而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论断的“中心词”“主旋律”和落脚点是“商品经济”。至此,“商品经济”的概念第一次被写入党的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邓小平同志对这一决定评价很高,称其“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决

定。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第一个市场经济改革的决定。根据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搭建了基本框架,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注意,这里用的是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第一个“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已成定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定位,这是石破天惊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谁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重大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铺平了道路。

第一个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提升:在总论部分,《决定》强调了“七个聚焦”,其中第一个“聚焦”,就是“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此可以判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高屋建瓴的“聚焦”,特别是对“充分发挥”的强调,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高度重视,这无疑为我们“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体制支撑。

综上所述,46年来,中国改革的脚步总体是“进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今后,在改革的新征程上,必须持之以恒地“进”,而不能“退”,也不能“停”。

“全”: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下的“全方位改革”

“全”是范围问题,指的是“全方位”,不是“单向度”,不能“残缺不全”。这就需要我们打开改革的格局与视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笔者具体从三个层面作一分析。

首先,从整个改革的总体层面上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最初几年,我们进行的改革基本上针对的是某个特定的领域。例如,最先从安徽农村开始的改革,聚焦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在四川也搞了部分国有企业的“扩权”试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则主要聚焦在“经济领域改革”做文章,“经济领域改革先行”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阶段性的特征之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不仅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五位一体”体系,而且在此基础上,《决定》还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作了改革部署,还特别强调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形成了“5+2+1”的总体格局,15个部分60条,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相应地,在表述上也将“全面深化改革”调整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体现了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上也讲究“全”。在“五位一体”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担负“牵引”使命的。从谋篇布局看,它包括六方面,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宏观经济治理、城乡融合发展和对外开放。这六方面基本涉及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和开放的所有重要领域。

再次,在社会领域,对于与经济改革直接相关的、涉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改革也较“全”。因为这类民生性改革,关系到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满足程度。其中,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与人口发展“五个方面”与人们息息相关,“五指一巴掌”,“一个也不能少”。

总之,改革要把握“全”,不能“单打一”。基于此,《决定》在总论压轴处,赫然强调改革“三性”,即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深”:从体制、结构到“人本根基”的纵深化改革

“深”是力度问题。鉴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如中央所说“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现在需探讨的是中国改革“深化”应“深”向哪里?我认为重点有“三向”。

第一,深向体制。“制度”“机制”“体制”等词在《决定》中高频出现,充分显示《决定》“深向体制机制”的追求。例如,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头戏,《决定》明确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意味着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已进入向纵深发展阶段。市场体系里固然有商品市场,但“最硬核”的东西是要素市场,这是市场体系大厦的“钢筋”。

回想40年前,笔者亲历的1984年

莫干山会议曾提出“价格改革调放结合”(后被称为“价格改革双轨制”),但当时锚定的只是“商品价格”。经过40多年的改革,如今我国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已达97.5%,但要素市场化程度远未达到理想程度,有的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和掣肘因素,深层问题就指向要素尚未市场化。按《决定》的提法,“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纵向联系看,由当年商品市场化改革到现在致力于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然也会触及中国经济体制内部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第二,深向结构。除大家比较关注的产业结构变革外,笔者特别提醒关注“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决定》鲜明提出“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同时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这不仅体现了市场体系的平等性,而且体现并贯穿了所有制体系的平等性和法治的公平性。这是相当深刻的,它“深”在夯实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制度基础。

第三,深向“人本根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根本价值目标。在现阶段,实现“三高”(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需“高人”,“高人”重点包括“三大人群”。

一是劳动者。《决定》提出“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同时针对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作出一些细化的规定。

二是科研人员。《决定》提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赋权改革。”这意味着人本要素将“放手”,从而使“人本产权”的价值得到进一步释放。

三是管理者。《决定》指出:“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人本根基扎得深,就能激励调动人。当然,这些深向“人本根基”的改革举措能否具体落实,进一步激发人的创造潜能,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做出艰苦的努力。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

之江青年论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如何把基层群众有效地组织到共同治理的过程中来,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一环。从价值导向、运行机制、制度效能上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蕴含着共同的特征。

从价值导向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都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有效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而基层治理的重要目标则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广大社会公众则是“共建共治共享”的主体和主角。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在价值旨归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都以增进人民福祉和扩大公共利益为目标。

从运行机制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都强调参与渠道的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广泛化、参与方式的有效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则由一系列制度体系给予保障。比如:不断健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完善的民主协商制度进一步拓展了意见充分表达、共识广泛凝聚的渠道等等。基层治理要达到有序治理的目标,则需要搭建各类平台、拓展对话沟通的渠道,凝聚多元共识、整合多元利益和诉求。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在体制机制的设计上具有深度互嵌性。

从制度效能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都注重结果的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中,既要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注重民主过程和民主程序,更要坚持问绩于民、问效于民,注重民主成果和民主实质。基层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基层善治,“善治”不仅包含了治理过程的有序性和参与的平等性,也蕴含了治理结果的有效性。

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正在向全面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目标推进。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具体要把握好三方面关系。

一是有效把握制度统一与多元探索的有机联系。我国幅员辽阔,基层情况复杂多样。在基层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民主治理的核心精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推进民主过程与民主成果、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质的统一,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不断保障人民权益。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地区差异、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鼓励基层社会大胆创新,不断形成基层治理的创新经验。全过程人民民主统一框架下的基层多元化、自主化实践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和民主治理的实践,只有充分把握民主实践中统一和多元的关系,才能有效提升基层治理的制度效能。

二是要推动落实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有机统一。民主科学决策是基层治理成败的关键,但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并非总是有机统一的。当前,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多样、关心的问题多元,在基层治理中,妥善把握和正确处理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关系,是对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极大考验。为此,要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依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等,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充分谋求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以决策程序的民主化、科学化来保障决策结果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要通过多轮次的民意汇集、意见征询和讨论研究,不断凝聚共识,总结出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的决策,达成民意的多数性与决策的有效性之间的有机统一。

三是要实现民主与民生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效,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从根本上就是要实现“以民主促民生”。既要“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的回应力和行动力进一步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治理优势,也要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治事态度,持续推进民生实事工程,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人民群众的小事,就是民生的大事,只有着力解决这些“小事”,才能真正贴近百姓的心,要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来保障民生实事的有效落实。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

思想漫谈

讲好钱镠故事,赓续吴越国文化

俞明雅

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从公元932年这位一方霸主辞世起,有关他的叙事便展现出令人瞩目的蓬勃活力。无论是官方正史如《旧五代史》,还是杂史笔记如《湘山野乘》,话本小说如《临安里钱婆留发迹》,戏曲文本如《金刚凤》《归元镜》,抑或是历代江南方志中的传说,乃至明清以来的大部分钱氏家谱,皆在不同的书写与记录情境下,以长短各异的篇幅表述着钱镠生前身后的诸多事迹,呈现出纷繁错综、迥异更迭的叙事面貌。受钱镠叙事丰富性与活跃性的吸引,我的博士论文便围绕这一兼具历史性与传奇性的人物形象展开分析。回顾过往研究历程,除却学术层面的丰硕收获外,我亦在钱镠叙事跨越千年的流动中,真切感受到了吴越国文化生生不息的脉搏所在。

作为钱镠叙事的核心传承群体之一,钱氏后裔是我在研究过程中最常接触到的一类人群。倚赖于泛黄的故纸堆,我得以相隔数百年时光,触及如钱德洪、钱泳等致力于躬耕吴越钱氏文化的历史先贤的内心;在今日如西湖钱王祠等意义非凡的纪念空间里,各地不畏险阻、积极投身于钱镠研究会建设的前辈长者,更是向我毫无保留地分享他们传承钱镠故事、发扬先人精神的既往经历与美好愿景。古时之人,以其智慧与才情,为后人存续了诸多文字记忆与珍贵事迹;今时之人,亦凭其热忱与力量,身体力行地传承与创新吴越国文化。时空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省中医药大学】

社科论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国家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国际交流和文化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国际传播,把历史文化名城推向国际社会,提升其全球的文化形象和知名度,使之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

城市文化国际化传播的问题与不足

城市文化传播是把有形的城市产业特色、建筑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和无形的城市精神、城市理念、城市价值观等文化内容,通过形式多样的传播媒介进行统一化、识别化、多元化的传播,从而提高城市的影响力。近年来,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国际化传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也有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在进行国际化传播时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一是城市定位同质化。一个城市的核心文化和定位是很难被模仿和复制的。比如提及西湖、断桥等,大家首

先想到的就是杭州。但是,一些城市在进行文化传播时并未深入挖掘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使得城市形象塑造和文化传播符号千篇一律,在国际社会上缺乏独特的城市形象。

二是传播内容片面化。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资源涵盖了历史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在资源共享交流、文化整合利用、媒体整合传播体系上不够协调和统一,导致城市文化中的某个元素“出圈”,但城市的整体形象并未得到真正提升。

三是传播体系单向化。一方面,传播手段较为单一。目前,网络上的国际传播手段非常丰富,但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在国际化传播中,应用的传播手段仍然比较单一,既表现在文化表达形式上的单一,也表现在文化传播渠道和交流方式上的单一。另一方面,文化传播主体有待多元化。在新媒体时代,公域流量和私域流量同样重要。特别是国际化传播路径中,既要由政府为主导,也要民众和团体协调配合,从而弥补国际知名媒体关注度不够、自身多元化国际传播渠道欠缺的不足,提高传播广度和深度,构建文化传播的良性生态体系。

提升城市文化国际传播力的方式

历史文化名城要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需要坚持以文化为传播核心和精髓,不断适应新的媒体传播形

式,增强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做好“文化+”的“活”文章,让文化可看、可听、可体验。具体而言,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打造城市文化IP,以文旅融合实现文化的活化利用。适应当下语境和市场是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的根本。打造城市文化IP是提高城市辨识度、建构城市产业链的必要手段。一方面,可以立足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围绕具有特色的文化场景,设计文化精品旅游体验线路和文化研学线路。另一方面,可以以文创IP为基础,打造具有鲜明城市视觉形象识别的伴手礼和延伸产品。比如,绍兴可以对鲁迅、兰亭、陆游、唐婉、徐渭、蔡元培等鲜活又有历史底蕴的绍兴名人形象,进行相关文创产品研发。文化的活化和传承必须要有物质属性的载体,开发带有城市文化烙印、高质量的文创IP,能将历史文化名城中的文化故事传播得更远更广。

二是丰富民俗节庆文化活动,整合文化资源。民俗节日庆典是公关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展示城市文化、维系社会情感的特色活动和仪式。历史文化名城既要举办好线下的民俗节日庆典等活动,也要利用好新媒体技术,在线上直播丰富的节日庆典活动,从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获取更多的受众。浙江的诸多历史文化名城,可以深入挖掘、梳理和研究宋韵文化,进而扩大城市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感召力。比如,宋韵文化节正渐渐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宋韵

在基层治理中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陈洁琼
方柏华

重要窗口 | 理论周刊·新论